

语言传播的理论探索*

王 辉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语言传播研究历史不长,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语言传播的主要理论框架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基于前人的理论模型,本文尝试建构了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模式理论模型:混合模式及基于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并对语言传播理论研究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 语言传播;理论建构;混合模式;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397(2019)02-0020-10

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19.02.003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WANG Hui

Abstract: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tudies do not have a long history but are of great values in research, as well a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majo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uilding on previous theoretical models,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formulate a language communication model in the globalization age, a mixed model that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also predict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Keyword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ixed model; future direction

[收稿日期] 2018-07-30

[作者简介] 王辉,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研究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语言政策、语言传播及文化交流。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中东主要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16BY052)的资助。

一 引言

语言传播行为自古有之,语言传播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公元前4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拉丁语从罗马广泛传播至帝国境内,并衍生出罗曼诸语言。再如,经过400多年的传播,英语从16世纪时使用人口仅500~700万、且几乎仅限于不列颠诸岛的岛国语言,发展成为使用最广泛的全球通用语。最近的例子是汉语的国际传播。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汉语迅速走向世界,成为语言传播的又一典范。

但是,语言传播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以语言传播领域第一部论著——《英语的传播: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社会语言学》(Fishman et al., 1977)为正式开端,至今才约40年时间,可见,语言传播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从早期的现代化工具,到政治议程,再到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这些特征构成了语言传播研究历史演进中的重要脉络。

语言传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语言传播在社会语言学、政治社会学及历史语言学中有重要地位(Mesthrie 2001)。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语言传播已成为一种超越国家边界的常见现象,对塑造全球语言格局有重要影响。语言传播对世界语言生态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一带一路”的推进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重要意义(王辉 2017)。遗憾的是,国内外学术界对语言传播的理论研究非常稀缺,语言传播理论建设跟不上语言传播实践的需求。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往往只重视从汉语出发思考汉语的传播,迫切需要其上位理论,即语言传播理论的指导。鉴于此,本文将对语言传播的主要理论框架进行概述和分析,并基于前人的理论模型,尝试建构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并对语言传播理论研究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二 语言传播的主要理论框架及分析

语言传播也被称为语言扩散、语言扩张或语言散播。从学科属性上来讲,语言传播研究是语言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Gacia 2002)。Cooper(1982)给语言传播下的定义被学术界引用最多,他认为语言传播是某个交际网络为了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而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范围不断扩大。Cooper强调语言传播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李宇明(2007)也定义过语言传播:即A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语言的族际传播。

语言传播是语言规划的目标之一(Nahir, 1984)。语言传播不仅是地位规划的目标,也是习得规划的目标。Cooper(1989)认为:鉴于语言传播是语言规划的一个经常性目标,将语言规划和语言传播这两种现象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下看待是有用的。

40年来,语言传播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些学者试图构建理论框架来分析语言传播的原因和规律。现对几个代表性的语言传播理论框架进行概述和分析。

(一) Cooper的语言传播变量理论

Cooper(1982)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分析语言传播,即:传播的是什么;传播时间;传播媒介。

其一,语言传播是语言行为的传播,可以从形式、功能和普遍性三方面来分析。形式指被传播语言或语言变体,功能指语言或语言变体传播的目的,普遍性指说话者为实现一定的交际功能而使用一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程度。其二,采纳一门语言是需要时间的,掌握了一门语言

在不同时间点上采纳者的变化情况,就可以描绘出一条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传播的曲线。其三,语言传播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传播,不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传播。Cooper抓住了语言传播行为的三个基本问题,为我们理解语言传播的本质提供了参考。

Cooper借鉴传播学里的创新扩散理论,围绕影响语言传播的7个变量,列出了一个语言传播问题清单(Who, adopts, what, when, where, why, how)。在这个问题清单中,Who指的是:采纳者与非采纳者、早采纳者与晚采纳者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语言传播较快和较慢甚至不传播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Adopts指的是:不同的采纳层级(如使其意识到、持拥护态度、得体使用、经常使用)传播速度是否不同?传播程度是否不同?采纳层级中前者是否一定是后者的前提条件?What指的是:采纳的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与什么样的结构特征有关?采纳的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与什么样的功能特征有关?When指的是:一个特定的语言变体被一定的交际网络在一定的条件下采纳,需要多长时间?传播曲线的不同与什么样的特征有关?Where指的是:哪种社会领域内的哪种社会互动会促进或阻碍人们对创新的接受?就采纳者类型和采纳程度而言,那些可能会对语言变化产生影响的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Why指的是:传播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与国家和个人促进或阻碍语言传播的何种动机有关?传播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与潜在的采纳者接受或拒绝某种语言变体的何种动机有关?How指的是:针对不同类型的采纳者,在不同的采纳层级,通过不同类型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下,什么样的语言规划行为最有可能成功?

这个框架围绕速度和程度这两个衡量语言传播效果的关键指标,用一个统一的问题框架归纳出语言传播的采纳者、采纳层级、采纳语言(或语言变体)、采纳时间、社会条件、采纳动机以及为采纳而进行的语言规划行为等7个变量,并用14个问题表述其内涵,考虑全面,逻辑清晰,既有微观考量,又有宏观视角,有利于从多个角度理解和解释影响语言传播效果的各种因素。这个框架的局限之处在于:语言传播行为固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但过于宽泛的框架不利于发现影响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

(二) 语言传播模式理论

语言传播模式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语言传播模式理论主要包括Quirk(1988)、Phillipson(1992)、Spolsky(2004)等提出的理论框架。

1. Quirk提出的三种语言传播模式

Quirk(1988)提出三种语言传播的主要模式。第一种为“人口模式”,将语言的传播直接归因于说某种语言的人口的迁移,如英语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传播。第二种模式为“经济文化模式”。此模式与人口的迁移没有太大关系,比如英语作为科技和商业语言媒介的传播。第三种模式为“帝国模式”。这种传播模式也不依赖于人口的迁移,而是政治上的统治,比如英语在印度的传播。

一门语言的国际传播,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关键因素。Quirk提出的这三种模式是语言传播(尤其是英语传播)的传统模式,揭示了语言传播背后的人口迁移、经济文化和政治统治等因素的重要作用,有一定说服力。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语言何以迅速而广泛传播?显然,这三种模式难以完全适用。依靠政治统治的“帝国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今天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人口模式”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还没有构成今天语言传播的主流模式。“经济文化模式”持续推动了英语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但对全球化时代语言作为软实力传播的复杂性及技术依赖性考虑不足,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全球化时代需要建构新的语言传

播模式。

2. 语言帝国主义

由于 Quirk 没有提供把不同的模式连接成一个综合的理论阐述的基础, Phillipson 通过他的假设模式, 将其他要素包含在帝国模式里(Brutt-Griffler 2002)。Phillipson(1992) 的主要观点是: 英语的全球传播是英美等核心英语国家有意识的语言推广努力的结果。英语帝国主义是通过在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建立和不断重建结构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以确立和维系英语的主宰地位。文化和结构上的不平等确保了更多的物质资源持续地配给了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 使那些熟练运用英语的人受益。

例如, 成立于 1934 年的英国文化协会是英国海外推广英语的核心机构, 其 2016~2017 年度报告显示: 用于英语传播上的支出达 6.35 亿英镑, 占所有经费支出的 58%, 在所有支出中列第一位。这表明: 英语的国际推广是一种官方主导的有意识的语言传播战略。

语言帝国主义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甚至时隔 20 年之后国际英语教师协会(IATEFL) 在 2013 年年会上还组织过专门的小组讨论。支持者如 Pennycook (1998)、Canagarajah(1999) 等, 他们认为这个理论能够解释英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不平等。而另一阵营的 Brutt-Griffler(2002)、Crystal(2003) 等则认为语言帝国主义的观点言过其实, 无法反映全球的语言现实。

3. 选择主义

选择主义是与语言帝国主义截然相反的一种理论观点。其核心主张是: 英语的全球传播是由英语传播地的机构和个人的选择、支持造成的(Clayton 2006)。Spolsky(2004) 认为: 英语发展成为全球语言不是语言管理的最终结果, 而是反映了地区和个人对语言学习的决策, 是其对世界语言系统的复杂的生态变化的响应。选择主义更强调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对英语传播的决定作用, 而非核心英语国家自上而下的有意识推广。

作为两种代表性的语言传播模式理论, 语言帝国主义和选择主义处于语言传播因素的两端, 折射出后现代语言权势与现代性语言管理两种思想范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 语言传播行为的复杂性表明: 语言传播不可能只存在单一模式, 可能是语言帝国主义和选择主义及其他模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把语言传播模式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综合考虑, 才能避免单因素分析的缺陷。

(三) 语言传播的 Q 值理论

语言传播的 Q 值理论由荷兰社会学家 Abram de Swaan(2001, 2008) 提出。人类由多语者交错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语群。一种语言能否吸引他人学习使用, 很大程度上由该语言的交际价值(Q 值) 决定。Q 值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其使用者在语群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流行度); 二是其使用者中的多语者在语群所有多语者中的比例(中心度)。一门语言在语群中的流行度和中心度越高, 被学习和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大。语言的交际价值(Q 值) 由其流行度和中心度计算得出。可以用 N^S 代表某个语群(S) 中所有语言的使用人数, P_i 代表某种语言的使用人数, M^S 代表语群(S) 中所有多语者的人数, C_i 代表某种语言使用者中会多语的人数, 某门语言的 Q 值(Q_i^s) 等于流行度(p_i) 与中心度(c_i) 的乘积。其计算公式为:

$$Q_i^s = p_i \cdot c_i = P_i / N^S \cdot C_i / M^S$$

使用人数少的语言如果中心度大, 仍有可能比使用人数多的语言 Q 值高。

以英语和汉语为例。英语在全球大约 75 个国家和地区享有特殊地位, 或为官方语言, 或

为官方语言之一,或是作为主要语言来使用。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数大约3.29亿,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数大约为4.3亿,还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英语作为主要外语。目前英语作为外语学习和使用的人数达到5~10亿(Crystal 2003)。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是中国的通用语,也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据估计,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大约有13亿,以汉语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数大约有1亿。用以上公式和数据粗略测算,我们发现:英语和汉语的流行度比较接近,但由于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使用的国家和人口远多于汉语,英语多语者比例远高于汉语多语者比例,其中心度很高,因此英语的 Q 值要远高于汉语。

Q 值理论从语言的社会功能之一——交际功能出发研究语言传播的原因,并把一门语言的交际价值放在世界语言系统中去测量,是一种可量化的、科学性较强的语言传播理论。但是,人们学习一门语言并不总是与这门语言的交际价值相关,也可能与文化价值或认同价值等因素相关。因此, Q 值理论的普适性和解释力还需完善。

(四) 语言传播政策理论

语言传播政策或语言扩散政策是一个新术语,指的是面向新的说话者或语域以传播某种(些)语言为目标的政策。语言传播政策也包括稳固一门语言的使用,提升语言使用的技能,改变语言使用的态度,增强或扩大语言在任何语域的地位和功能(Ammon,1997)。

语言传播政策按传播范围划分,可分为国内语言传播政策和国际语言传播政策。也可以按照政策是否明确可见,分为显性语言传播政策和隐性语言传播政策。比如,孔子学院总部制定的《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既是国际语言传播政策,又是显性语言传播政策。

制定和实施语言传播政策的动机主要包括:获得本族语在交际上的优势;传播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发展经济关系;增加一个国家的外语学习和语言相关产品的收入;保持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感(Ammon,1997)。语言传播政策的动机可以是语言内的,也可以是语言外的,从表面上看主要与语言的交际功能有关,实际上也跟语言蕴含的意识形态、认同功能、经济价值等密切相关。语言传播政策的动机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杂的、动态的。

当前,除了语言传播政策的动机外,语言传播政策其他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鉴于语言传播是语言规划的目标之一,语言传播政策有必要放在语言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语言传播政策可看作是语言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进一步划分为语言地位传播政策和语言习得传播政策。前者是为了提高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地位而采用的语言传播政策,比如将汉语学习纳入某国民教育体系;后者指的是为了增加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学习人数而采用的语言传播政策,比如“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内某些高校为提高某种非通用语言的学习人数而新增专业或扩大招生规模。

三 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模式的构建

语言传播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进程之中。社会文化进程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还包括说话者个人在社会互动中的语言和心理过程(Wei et al.,1997)。当前,全球化是语言传播所处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进程(Gacia,2010)。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语言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日益频繁的社会现象。语言传播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全球化增加了语言国际传播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语言国际传播的必要性。语言传播不仅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的组成部分和重要途径,也是国际间人才、资本、信息流动的必要条件。

信息化加快了语言传播的速度,也提高了语言传播的程度,拓展了语言传播的虚拟空间。语言可以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技术和途径得到迅速、广泛传播。

从语言传播模式来看,全球化时代政府对语言传播的推动既有全球化资源流动和配置的便利,又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环境和诸多不确定性(王辉 2015)。同时,个人的语言权利和语言选择日益受到尊重,语言传播的个性化需求在扩大。无论是 Quirk 的三种语言传播模式,还是语言帝国主义强调的政府推动模式,或是选择主义强调的选择模式,都无法适用和解释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新现象和新趋势。

(一) 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

全球化时代,以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上下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混合模式,是 Quirk 的三种语言传播模式之外,将语言帝国主义和选择主义调和之后的新模式。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认为: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模式不是单一的。政府和市场均在语言传播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语言传播效果取决于政府的意愿、能力和市场需求的优化组合。语言传播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显著增强。

全球化背景下,扩大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传播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政府重在政策引导、语言规划等方面,市场则在开发语言学习需求、提供语言产品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政府推广语言的意愿和能力反映了政府对语言在全球化进程和文化软实力提升中的作用的认知,即政府的语言意识,以及政府对语言推广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程度。市场则反映了一门语言的受欢迎程度,即市场的语言偏好。一门语言的传播程度和速度是政府的语言意识、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程度及市场的语言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府的推动力和市场的拉动力都有大有小,二者之间的组合形成了语言传播混合模式的不同类型。依据政府推动力和市场拉动力的大小,混合模式可划分为四种类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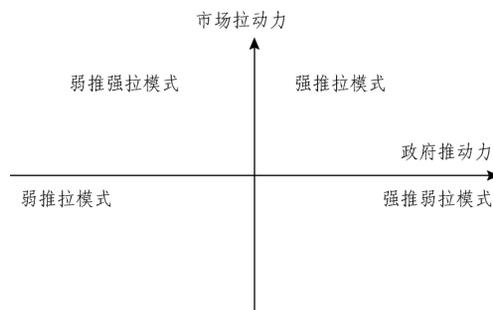


图 1 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

模型中政府的推动力包括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备推广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意愿和能力,市场的拉动力指由语言学习者或潜在的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形成的市场力量。强推拉模式发生的条件是政府具有推广某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强烈意愿和能力,同时市场对这门语言或语言变体也有旺盛的学习需求。从传播效果上看,强推拉模式有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推动,又有市场的强大拉力,是语言传播混合模式中的理想模式。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世界各国的汉语学习需求旺盛,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软实力提升和孔子学院建设。孔子学院建立十余年来,从传播广度、强度、速度来看都很高,影响力也在逐步扩散(Gil 2017)。当前的汉语国际传播正在走向强推拉模式。

强推弱拉模式发生的条件是政府具有推广某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强烈意愿和能力,但市场对这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学习需求不足。例如,苏联解体以后,学习俄语的人数锐减,俄罗斯政府为提高俄语的国际影响力,依然对外大力推广俄语。

弱推强拉模式发生的条件是某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学习需求很旺盛,但政府不具备推广这门语言的强烈意愿和能力。例如,当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随着中资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小语种人才的需求扩大,但沿线大多数国家推广本国语言的意愿和能力不足,无法大力支持该国语言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播。

弱推拉模式下政府不具备推广某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强烈意愿和能力,这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学习需求也不足。很多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政府无意愿、无能力推广本国语言,本国语言的海外市场需求也有限。

政府的语言传播政策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因此图1的模型又可细分为显性强推拉模式、隐性强推拉模式等八种类型,如表1所示。

表1 显性和隐性混合模式类型

显性和隐性混合模式类型			
显性强推拉型	显性弱推强拉型	显性弱推拉型	显性强推弱拉型
隐性强推拉型	隐性弱推强拉型	隐性弱推拉型	隐性强推弱拉型

八种类型中,究竟采取显性还是隐性模式,主要可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被传播语言的声望,二是文化的同质性,三是市场反应。语言声望指的是社会成员对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尊重程度,有高低之分(Ager 2005)。通常如果被传播语言的声望高、影响力大,则可以采取显性混合模式,如法国通过法语联盟、法国文化中心等语言传播机构主动向世界推广法语。如果两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同质性明显,则可以采取显性混合模式,如成立于2007年的“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在中亚、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重点建立俄语中心和俄语学堂来推广俄语,而这些地区由于历史和民族等原因,与俄罗斯文化比较接近。如果市场对显性政策有较好的反应,则宜采取显性混合模式,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非合作的深化,汉语受到非洲国家当地学习者的普遍欢迎,中国也因此加大了非洲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建设。根据国家汉办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已在非洲43个国家设立了59所孔子学院、18个国家设立了41所孔子课堂。而在语言声望不高、文化同质性不显著或者市场反应不好的情况下,采取显性政策可能会遇到较大阻力,因此宜采取隐性政策。

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可以将Quirk的三种语言传播模式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融合到政府的意愿和能力中,人口迁移因素融合到市场因素中,将语言帝国主义和选择主义各自强调的政府和市场因素兼顾考虑,从而使上述三种重要的语言传播模式理论衔接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

(二) 基于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 +

信息技术对语言传播具有深刻影响,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需要进一步与信息技术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飞速发展使语言传播由人际传播向人机传播发展。虽然传统的人际传播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有重要的作用,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语言传播越来越重要。例如,孔子学院总部每年选派大量教师和志愿者赴海外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这是典型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缺点是成本高、受众有限、时空受限。为满足全

球更多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孔子学院推出基于网络的汉语课程和考试,打造数字孔子学院和汉语学习云平台,这就是语言传播中的人机传播。人机传播相对成本低、共享性强、不受时空限制,越来越受到学习者欢迎。语言传播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将极大改变语言传播的方式。语言传播与智能翻译、人机对话等深度融合,将成为语言传播的新途径。究竟采用哪些自然语言作为智能机器人的基础语言和人机交互语言,将成为人机传播中语言地位博弈和市场竞争的关键。

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同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将会形成语言传播混合模式+,即语言传播混合模式+互联网、语言传播混合模式+大数据、语言传播混合模式+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型拓展模式,呈现不同的应用方式(见表2),从而改变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态,也为语言传播模式创新提供新的路径。

表2 基于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	应用方式
混合模式+互联网	在线语言教学、翻译、测试等
混合模式+大数据	语言政策制定和分析、语言资源挖掘与分享、语言学习需求分析和市场预测等
混合模式+人工智能	智能翻译、人机对话、自动作文等

基于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因利用的技术不同,要想获得技术上的兼容和支持,实现无障碍传播,语言传播目标国家(地区)的技术条件与被传播语言所属国家(地区)的技术条件必须兼容和匹配。此外,被传播语言自身的信息化程度也要与信息技术的应用相适应,通常语言传播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越强,被传播语言的信息化水平就需要越高。

政府和市场对信息技术的混合模式+有不同的应用方式。政府的推动方式主要表现在利用信息技术对语言资源和语言政策进行优化和配置,提供更为精准的语言政策和公共语言服务等,而市场的拉动方式则表现为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和分析预测语言学习需求,开展语言教学、人机对话等。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要考虑语言传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根据社会文化进程的变化将语言传播调整和转换到最佳模式,才能达到语言传播的效果。同时,也要高度重视隐性语言传播模式,政府在推动语言传播中可以借助隐性政策来减少语言传播中的意识形态争议和文化冲突。基于信息技术的语言传播混合模式+需要特别考虑语言传播中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语言传播受到技术的驱动,但不能被技术裹挟,应保持对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四 语言传播理论的未来走向

语言传播从20世纪70~80年代适应现代化进程到今天顺应全球化发展,汉语传播从适应现代化之路到服务“一带一路”,一直发生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变化的社会进程中。

回顾40年来语言传播研究的发展,我们发现,语言传播研究相对比较零散,视角宽泛,理论研究深度不够,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虽然已形成前文论及的理论框架或思想,但至今依然没有形成公认的核心理论。语言传播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尚未明确,语言传播理论研究亟需加强。

结合 Tollefson(2002)、王辉(2013)对语言规划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及 García(2002、2010)对语言传播研究的概述,对已有语言传播理论研究成果和语言传播所处的社会文化进程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随着人们对语言传播重要意义的认识逐渐加深,未来的语言传播理论研究领域将日益受到重视。理论意识将进一步增强,研究方法将更加科学化,将更加注重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模式和规律的研究,从当前的碎片化研究转变到对核心理论和共性问题的探索,从而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语言传播理论研究的交叉学科属性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将更加注重语言传播与政策科学、跨文化传播、国际关系、市场营销、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从研究领域上看,将更加关注语言传播与全球化的融合发展和互动关系,更加关注语言传播与文化认同、话语体系建设、经贸发展及人口跨国流动等社会文化进程的联系,更加注重汉语国际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更加注重语言传播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随着对濒危语言的关注和对个人语言权利的重视,将更加关注语言传播对维护语言生态和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影响、非通用语言及方言的传播以及微观层面的语言传播。

当前,汉语国际传播理论需要吸收借鉴已有语言传播理论,既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人云亦云。只有将汉语国际传播放置在全球语言传播的统一框架和社会文化进程中进行理论传承、借鉴和创新,才能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满足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对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需求,对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真正起到指导作用。这也是本文概述分析既有的语言传播理论并试图构建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模式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 [1] 艾布拉姆·德·斯旺. 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 [2] 李宇明. 探索语言传播规律——序“世界汉语教育丛书”[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4).
- [3] 王辉. 语言规划[A].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4] 王辉. 全球化、英语传播与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5] 王辉. 以语言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 光明日报,2017-12-17.
- [6] Ager, D. Image and Prestige Planning[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5,(1).
- [7] Ammon, U. Language Spread Policy[J].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1997,(1).
- [8] Brutt-Griffler, J. *World English: A Study of its Development*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2.
- [9] Canagarajah, A. S. *Resisting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0] Crystal, 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M].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1] Clayton, T. *Language Choice in a Nation Under Transition: English Language Spread in Cambodia* [M]. New York: Springer, 2006.
- [12] Cooper, R. L. (Ed.). *Language Spread: Studies in Diffusion and Social Change* [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3] Cooper, 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4] De Swaan, A.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nd Blackwell, 2001.
- [15] Fishman, J. A., R. L. Cooper, and A. Conrad (Eds.). *The Spread of English: The Sociology of English as*

- an Additional Language* [C].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77.
- [16] García, O. Language Spread and Its Study: Narrowing Its Spread as a Scholarly Field [A]. In R. Kaplan (ed.).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7] García, O. Language spread and its study in the 21st century [A]. In R. Kaplan (ed.).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8] Gil, J. *Soft Power and the Worldwid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roject* [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7.
- [19] Mesthrie, R. (E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Sociolinguistics* [C].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1.
- [20] Nahir, M. Language Planning Goals: A Classification [J].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1984 (3).
- [21] Pennycook, A. *English and the Discourses of Colonialism* [M]. London: Routledge, 1998.
- [22] Phillipson, R. Linguistic Imperial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3] Quirk, R. The question of standards in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English [A]. In P. H. Lowenberg (ed.) *Language Spread and Language Policy: Issues, Implications World English and Case Studies* [C].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4] Spolsky, B. *Language Polic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5] Tollefson, J. W. Limitations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In R. B. Kaplan (ed.).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6] Wei, L., V. Saravanan, and J. N. L. Hoon. Language Shift in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 Family Domain Analysis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997 (5).

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19.02.004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三届学术研讨会 暨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江苏徐州召开

2019年4月19日至21日,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三届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江苏徐州召开。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教育部语用司政策法规与督查处副处长郑威、教育部语用所副所长魏晖、江苏师范大学校长周汝光、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靳光瑾等出席会议。

4月20日上午,开幕式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师大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杨亦鸣主持开幕式。周汝光校长致欢迎辞,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推进和提升学校语言学学科建设发展。郑威副处长代表学会挂靠单位领导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对学会未来的发展提出要求。国际计算语言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李生教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大学吾守尔·斯拉木教授等12位特邀专家为会议奉献了精彩的大会报告。4月21日,100多位学者在分会场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此次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换届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领导班子,并通过了学会章程修订案。靳光瑾研究员当选为会长,王旭明、黄行、杨亦鸣、彭泽润、杨光荣当选为副会长。秘书长由郭龙生研究员担任。

(袁伟)